

毛泽东文艺论集

百花齊放
推陳出新
毛澤東

毛泽东文艺论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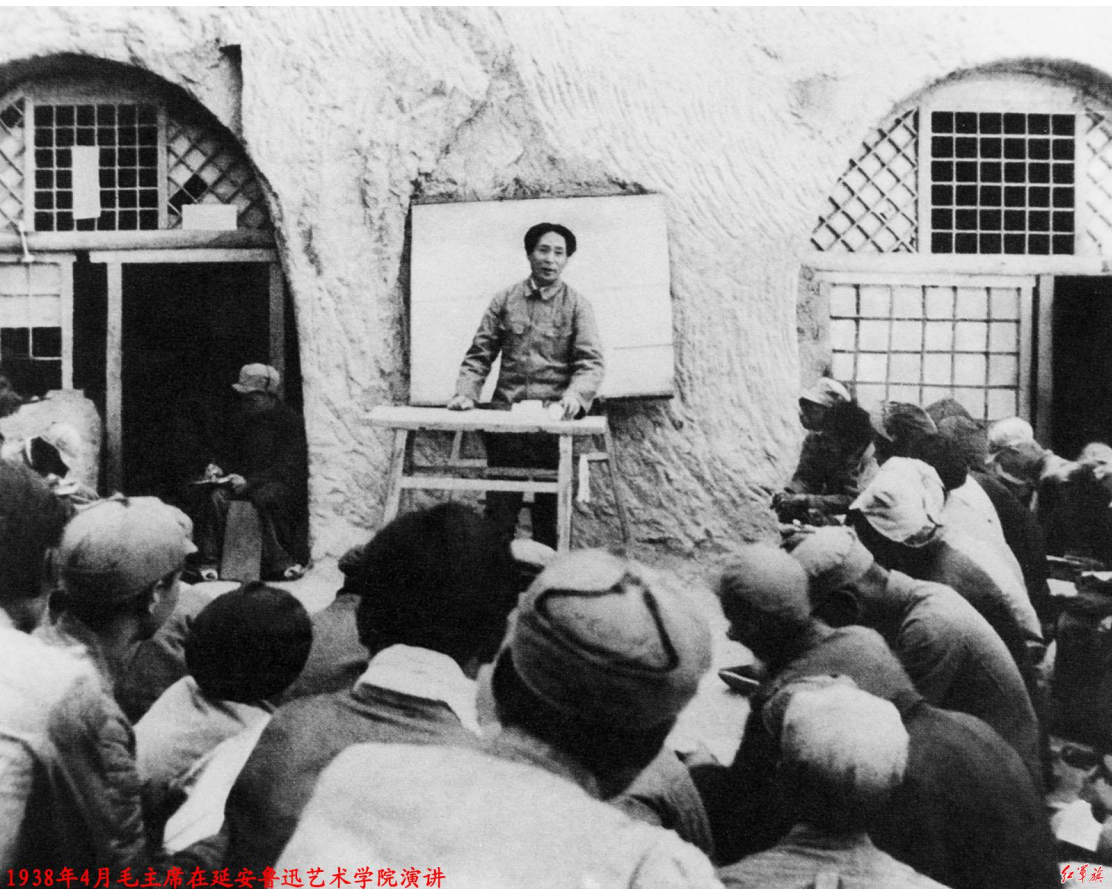
中央文献出版社

www.mzdbl.cn



1956年1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

红四网



1938年4月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

新华社



1942年5月毛主席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人员合影

红军游



1949年7月2日毛主席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向大会祝贺(左起: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



1951年毛主席与袁水拍在香山讨论文艺方针问题。左一江青 背对镜头是袁水拍
www.mzdbl.cn



1951年10月毛主席和著名粤剧演员范瑞娟等在一起
www.mzdbl.cn



1953年4月毛主席参观中央美术学院画展

红网



1954年8月毛主席会见电影艺术家舒秀文(左1)、著名桂剧演员尹羲(左3)



1957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后接受演员总送纪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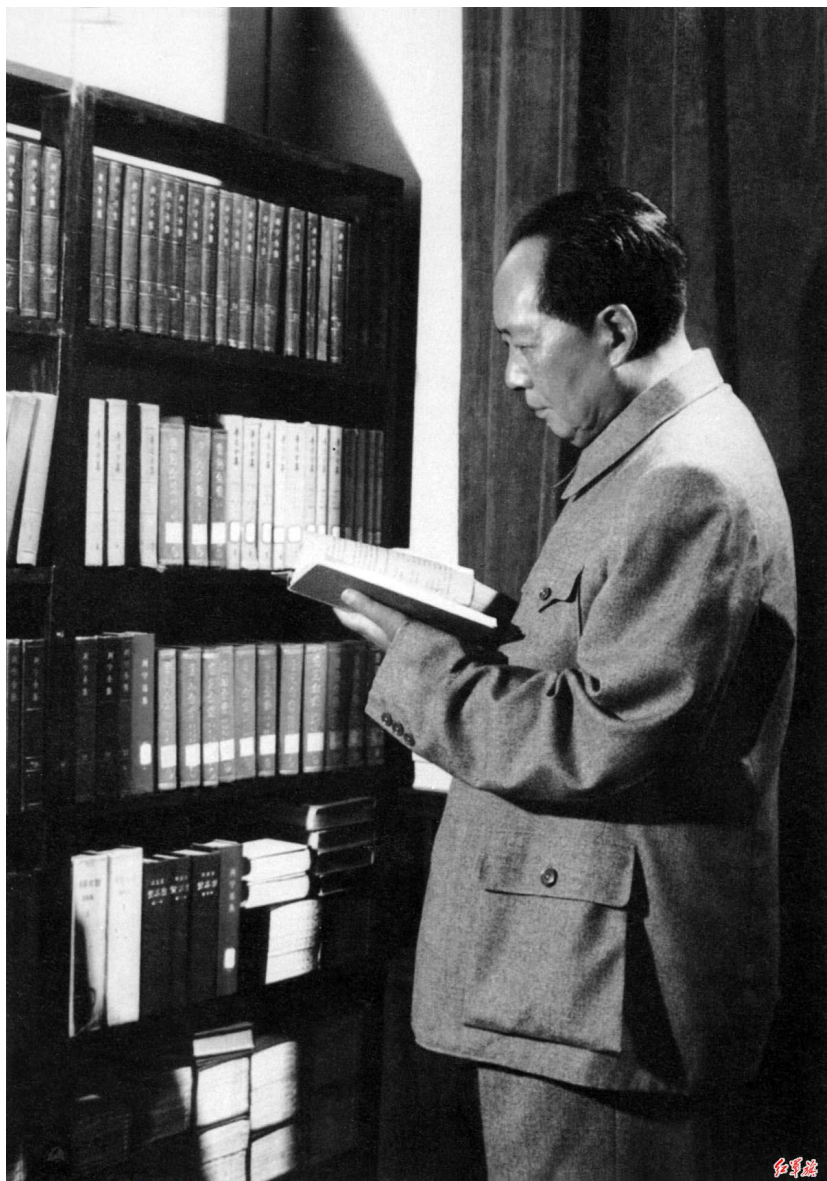
1958年3月7日毛主席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

www.mzdbl.cn

红军网



1960年7月23日毛主席接见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与田汉、梅兰芳、老舍



1961毛主席在庐山查阅鲁迅全集

www.mzdbl.cn



1963年与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1965年1月毛主席与杂技表演艺术家夏菊花握手

www.mzdbl.cn

红岸网

出版说明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留下了大量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稿。这些文稿，对于研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文艺运动，具有重要价值。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文艺论集》。

《毛泽东文艺论集》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共收入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稿一百零一篇，分为两辑。第一辑收入文章、讲话、批示、电报、题词以及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语等五十四篇，其中二十五篇是新辑录的(增订本该辑收入三十一篇，本书编辑时将其中的两篇合为一篇，并将另一篇同新辑录的两段谈话合为一篇)。第二辑收入书信四十七篇，其中十三篇是新辑录的。每辑都按文稿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第一辑新辑录的五篇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语，因写作时间不详，放在后面。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原有文稿中凡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的,均按《毛泽东文集》刊印。根据统一的编辑体例,对《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部分文稿的题解和注释,作了调整、补充和修订。

所收文稿,在每篇文末,都注明刊印所据的版本或稿本。凡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诗词集》、《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一般采用各书中原有的题目、题解和注释。为求得体例的一致,对其中有些题目、题解或注释作了改动或增补。属节选的另拟题目,在题解中作了说明。一为了方便读者,对一些人物、事件等作了简要注释。人物注释,一般只注当时任职,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生卒年(或生年)和籍贯。注释排印在每篇著作的后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二〇〇二年三月

目 录

第 一 辑

文化运动·····	(3)
(一九二七年三月)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神话与现实·····	(7)
(一九三七年八月)	
论鲁迅·····	(10)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15)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17)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接待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电报·····	(24)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	
学习·····	(26)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五四运动·····	(30)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	(33)
(一九三九年五月)	
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题词·····	(34)
(一九三九年)	
为刘岷题词·····	(35)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36)
(一九四〇年一月)	
改造我们的学习·····	(57)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反对党八股·····	(68)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88)
(一九四二年五月)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126)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138)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	
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艺术·····	(142)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50)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	(153)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154)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156)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	(159)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月三十一日)	
为悼念冼星海题词·····	(164)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	(166)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的贺电·····	(169)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	(171)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	(172)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173)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175)
(一九五一年)
-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176)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 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178)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80)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 关于文风问题……………(183)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 《合作社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按语……………(185)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 民族的好的东西要恢复并搞得更好……………(186)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88)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二日)
-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1)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03)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211)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片面性问题·····	(225)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放”还是“收”？·····	(229)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	(235)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	(137)
(一九五八年八月)	
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	(239)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	(245)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	(247)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谈《红楼梦》·····	(251)
(一九五九年 —— 一九七三年)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258)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词六首》引言·····	(260)
(一九六二年四月)	

- 《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 (262)
(一九六二年五月)
- 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 (265)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 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 (273)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 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 (275)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 (277)
(一九七五年七月)
- 读谢灵运《登池上楼》批语…………… (283)
- 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
批语…………… (285)
- 读白居易《琵琶行》及序文批语…………… (290)
- 读《西游记》批语…………… (292)
- 读《聊斋志异》批语…………… (294)

第 二 辑

- 致何香凝…………… (297)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致刘雪苇·····	(299)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致萧三·····	(301)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致周扬·····	(303)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致周文·····	(305)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致萧三·····	(307)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致刘雪苇·····	(308)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致萧军·····	(309)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	
致萧军·····	(311)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	
致欧阳山·····	(313)
(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	
致欧阳山、草明·····	(314)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	
致欧阳山、草明·····	(316)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	
致罗烽·····	(317)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	

- 致欧阳山尊、朱丹、成荫…………… (319)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致郭沫若…………… (321)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 致杨绍萱、齐燕铭…………… (323)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 致周扬…………… (324)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 致李鼎铭…………… (326)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 致胡乔木…………… (328)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 致丁玲、欧阳山…………… (329)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 致郭沫若…………… (33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致柳亚子…………… (334)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致沈雁冰…………… (336)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致萧三…………… (337)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 致柳亚子…………… (339)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致柳亚子.....	(341)
(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	
致柳亚子.....	(342)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致毛岸英.....	(344)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致周扬.....	(346)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致齐白石.....	(347)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致廖静文.....	(348)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致李敏、李讷.....	(350)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致臧克家等.....	(352)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致袁水拍.....	(354)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致刘少奇.....	(356)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致胡乔木.....	(359)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致周世钊.....	(361)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
- 致周恩来..... (364)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致刘松林..... (365)
 (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
- 致胡乔木..... (367)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
- 致胡乔木..... (369)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
- 致邵华..... (371)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
- 致章士钊..... (373)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 致郭沫若..... (375)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 致陈毅..... (37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 致康生..... (380)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 致刘大杰..... (382)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

第一辑

文化运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

^{*} 节选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十四件大事》一节的一部分。沿用《毛泽东论文艺》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换来唤去还有一句废话。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

* 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色中华》报《红中副刊》第一期上报道的毛泽东讲演略词。

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 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倡议，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协会的名称是根据毛泽东提议定下来的。组织协会是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神话与现实*

(一九三八年十月)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¹⁾，《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²⁾，《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³⁾和《聊斋志异》⁽⁴⁾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⁵⁾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

* 节选自毛泽东《矛盾论》第五节。沿用《毛泽东论文艺》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6〕}（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曰。”

〔3〕《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

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4]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5]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新的译文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用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6]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论 鲁 迅^{*}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¹⁾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²⁾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恳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

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³⁾，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⁴⁾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⁵⁾、俄国的普列汉诺夫⁽⁶⁾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

他在一篇文章⁽⁷⁾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根据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陕北公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成立，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

[2]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注译收入《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

[3] 这里所说的托派，指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斯基，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斯基分子，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鲁迅指出托派的“危险倾向”，参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6——589页）。

[4] 孔夫子及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自汉武帝以后，孔子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

[5] 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一九一八年出版《无产阶级专政》一书，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任职。

[6]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7] 指鲁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又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79-281页。

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

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①。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

现在应当不以那为满足——过去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准备时期的东西。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

组织十年来的文化成果，训练起万千的文化干部，送到全国各战线上去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根据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新中华报》第四三二期刊印。

* 这是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提供这篇讲话记录的柯仲平曾说明，这段话经过“毛泽东先生的亲笔丁正”。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注 释

[1] 亭子间的人指从上海等地来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人。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山顶上的人，指来自井冈山等革命老根据地的文化人。好吃，指内容切实、丰富、。好看，指艺术形式。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你们要我来讲几句话。可是我不熟悉艺术方面的问题，只能贡献一些粗浅的意见给你们参考。

一、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¹⁾，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²⁾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³⁾，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⁴⁾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二、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

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就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比如现在唱京戏，在戏报上已经看不见《游园惊梦》⁽⁵⁾之类的东西了，因为那样的戏在今天卖不了座。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

三、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好的艺术技巧。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术。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鲁迅先生在《毁灭》⁽⁶⁾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⁷⁾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⁸⁾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

那样做。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⁹⁾。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¹⁰⁾，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¹¹⁾，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

我们都知道高尔基^[1]，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至于艺术技巧，这是每个艺术工作者都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语言。但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要做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阵线上有些人所写的东西，缺乏丰富充实的内容，不合于客观的实际，艺术技巧也比较粗糙。这种缺点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 徐志摩（一八九六——一九三一），浙江海宁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

[2] 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释[2]。

[3] 一九三二年七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宣扬超阶级的文艺，受到鲁迅、瞿秋白的批评。

[4] 鲁迅艺术学院，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五月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

[5] 《游园惊梦》，传统剧目，取材于明代传奇《牡丹亭》。

[6] 《毁灭》，苏联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最早的中文本，由鲁迅据日译本转译，并据英译本和德译本参校，于一九三一年出版。

[7] 《红楼梦》，长篇小说，写于清乾隆时，前八十回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由高鹗所续。

[8] 《游击队员之歌》，原名《游击队歌》，贺绿汀作词、曲，写于一九三七年底。

[9] 五台山，指五台山地区，当时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0] 胡适之，即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实用主义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后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自己对文学改良的主张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11] 亭子间，见本书第16页注释[1]。

[12] 高尔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苏联著名文学家、政治活动家。主要作品有诗歌《鹰之歌》、《海燕》和小说《母亲》等。

关于接待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

各政治部：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抗战文艺工作团⁽¹⁾一组，计五人，由刘白羽⁽²⁾率领，随同美国参赞卡尔逊、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到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毛、谭
皓⁽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正给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各机关、部队政治部的电报。

注 释

[1] 抗战文艺工作团，是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的，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组成。其任务是：搜集战地材料，反映前线生活，推动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该团先后共派出六组到各地开展工作。

[2] 刘白羽，一九一六年生，北京人，作家。当时是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组长。

[3] 皓，即十九日。电报中常以诗词韵目代日“皓”韵在第十九组，即代指十九日。

学 习^{*}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

* 节选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

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

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¹⁾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

“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八股文是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亦称为八比。毛泽东同志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的文化队伍中存在着。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①、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

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

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即一八九四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按照中国的纪年方法，一八九四年为甲午年，所以叫做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由于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实行挑衅而引起的。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结果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承认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并使朝鲜变成日本势力控制之下的附庸国家。

www.mzdbl.cn

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

（一九三九年五月）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根据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延安的文艺工作》的记载刊印。

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 题词

（一九三九年）

发展抗日文艺，振兴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根据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延安的文艺工作》的记载刊印。

为刘岷题词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岷^{〔1〕}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毛泽东

根据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题词墨
迹选》刊印。

注 释

〔1〕 刘岷（一九一五——一九九一），河南兰考人，木刻家。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授木刻。当时他把到延安后创作的几十幅木刻作品手拓装订成册，分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一九四〇年一月）

——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東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

* 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一至第十五节。以第十一节的标题做本篇题目。

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 and 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

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¹⁾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²⁾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³⁾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

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⁴⁾，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

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⑤，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

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⑥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

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⁷⁾和北伐战争⁽⁸⁾。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

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⁹⁾，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¹⁰⁾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

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

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勱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

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奋斗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¹⁾（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

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

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⑫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

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

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⑬，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两广总督林则徐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打击英国侵略军。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2]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

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3] “五四”，即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 “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5] 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释[2]。

[6]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7] 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8] 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并组织了革命军队。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军向湖南挺进。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八月，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十一月在江西歼灭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十二月占领福建、浙江，一九二七年三月进入南京，上海。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所以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了长江、黄河流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

[9] 《向导周报》，即《向导》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10] 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11] 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12]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并称之为“全盘接受西化”。

[13]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

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外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

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

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酃县⁽¹⁾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²⁾，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多，为害相当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

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³⁾。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

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

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

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酃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 “边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所发行的流通券。“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该文中说：“研究必须搜集充分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

[4]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

反对党八股^{*}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①，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²⁾。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

看，“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

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於老八股和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

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讲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

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³⁾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

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互”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

“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

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⁴⁾。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奇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許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

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

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

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

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痼疾，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⁵⁾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

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10)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 and 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⁶⁾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

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⁷⁾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⁸⁾，韩愈也说“行成于思”⁽⁹⁾，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2] 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的文化队伍中存在着。鲁迅曾许多文章里反对革命的文化队伍中的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

[3] 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题名，一九三二年作，

www.mzdbl.cn

载《鲁迅全集》第五卷。

[4] 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5] 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一章第三节。

[6] 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7] 《北斗》杂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中。

[8] 见《论语》《公冶长第五》。

[9] 韩愈是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人，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作事成功由于思考，失败由于不思考。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①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

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

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

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穿，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

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晌。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

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

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中。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

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³⁾所批评的梁实秋⁽⁴⁾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⁵⁾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

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

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

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

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⁶⁾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

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

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

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⁷⁾。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⁸⁾，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⁹⁾，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

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

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⑩，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

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①。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

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⁷⁾那样：“政治 ——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 —— 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 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

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

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

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

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

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么？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

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

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

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

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¹³⁾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

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¹⁴⁾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¹⁵⁾，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¹⁶⁾，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

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五四”即五四运动。见本书第30页《五四运动》和第54页注释[3]。

[2]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里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创造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 鲁迅，见本书第 13 页注释[2]。

[4] 梁实秋，（一九〇三——一九八七）原名梁治华，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生于北京。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9、195—212 页）。

[5]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寇。

[6] 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7—238 页）。

[7] 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2 页）。

[8] 《小放牛》，一出流行的中国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答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有人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9] “人、手、口、刀、牛、羊”，这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小学国语课本都把这些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10]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属于较高级的音乐；《下里巴人》属于较低级的音乐。《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

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1]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2]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13] 亭子间，见本书第16页注释[1]。

[14] 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寇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土地为“大后方”。以别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小后方”。

[15] 法捷耶夫（一九〇一——一九五六），苏联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见本书第23页注释[6]。

[16] 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文艺界的同志最近开了几次会，座谈怎么样使文艺界的同志与我们在座的同志、与我们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相结合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同志也应该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了解党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就是在红军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文艺，比如写一写小说，搞个剧团，那是比较普遍的，此外也有歌咏，有宣传画、漫画。这些东西同现在的比较起来那是差得多，现在我们八路军所吸收的人才，种类要丰富得多，文艺工作也普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种“围剿”，即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军事的“围剿”就是反对红军；文化的“围剿”就是反对新文化，反对包含着革命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反对以鲁迅为首的在白区的革命的文化艺术。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这种“围剿”被打破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大批地到根据地里面来。所以，现在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有已经成了专门家的，还有许多没有成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艺术工作的，这种人更多。这种现象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我们根据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这个情况，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颁布之后，要更加好。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①，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但在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而且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

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

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²⁾，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是要结合还是不要结合，回答是要结合；那末接下来就是如何结合法，即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

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如果时间很长了，一定会发生很多习惯，一定会发生许多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们把这些东西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阻碍他们这个结合的过程的速度，阻碍他们自己的进步。所以在整顿三风⁽³⁾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现在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

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⁴⁾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这是一种。

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文艺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新党员当中有，老党员当中也有。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此外也还有像这样的问题，在对作品的评价上，有的同志说是抹杀了艺术性，也有的说是抹杀了革命性。所谓抹杀革命性，就是说，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方面，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当然忽视的程度也有轻

重的不同)。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些的偏向。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有这个偏向，但是有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相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这种“想”，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就是说，对革命性没有强调得好。这种偏向在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中很多，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偏向呢？有的，这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我们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够不够呢？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

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

那末，我们主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认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艺术性也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革命性怎样从低级的到高级的呢？对大地主，你跟他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地主是要租子、要封建制度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他也要抗日，只要不破坏他的封建制度，即使破坏也不要破坏得太彻底，抗日他就会来的。他来就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取他们抗日这一点，不能够取到他们别的东西，只要他们抗日就好。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需要民主，但他们所需要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生。至于人民大众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又有区别。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完全取得政权，或者没有主要取得政权的现在，他们至少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马列主义，实行马列主义。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⁵⁾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

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专门家中有这种观点的多。胡适之⁽⁶⁾的书，我们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墙报、民歌、民间故事，我们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压迫刚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写出几百字的墙报，是了不起的大事；不这样看，那就是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因此对群众的东西不喜欢看。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其中一部分有决心工农化的，他们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

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只有指导的责任呢？不是的，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这是非常危险的。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⁷⁾。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我们要使文艺工作者了解这些问题，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一两个月内了解更好，一两个月不能了解来他半年，半年不行来他一年。我们要

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这个方向进行，以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工农兵。这对作家本身也是有利的。“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死的时候如果作祭文也是这样作就好了，当然不是专门为了作祭文。张浩⁽⁸⁾去世，我们就作了祭文，名为对死人，实则对活人，就是告诉人们，你们不要自私自利吧！张浩革命一生，难道是为了作祭文吗？我相信不是的！所以文艺家要懂得这样的政策，其他同志也要懂得这样的政策，这是一个结合的过程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

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个阶级完全知识化以前，还要利用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2] 指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五月二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举行的三次会议。

[3] 整顿三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历时三年多。经过这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4] 王实味（一九〇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当时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毛泽东知道后，几次在谈话中提到不应当杀。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把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5] 托尔斯泰，这里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八二〇——一九一〇），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高尔基，见本书第23页注释[12]。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释[2]。

[6] 胡适之，即胡适。见本书第23页注释[10]。

[7] 《海上述林》，由鲁迅编校的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分上下两卷，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署“诸夏怀霜社”校印。高尔基修改、发表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见高尔基《关于小孩子》一文。《海上述林》上卷收入了这篇文章。

[8] 张浩，即林育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二），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在延安病逝。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 《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订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增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¹⁾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江丰⁽²⁾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8000 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³⁾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0000 字。

柯仲平⁽⁴⁾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范文澜⁽⁵⁾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邓发⁽⁶⁾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8000

* 这个征稿办法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拟订的。

字。

彭真⁽⁷⁾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日 15000 字。

王震之⁽⁸⁾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冯文彬⁽⁹⁾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付之，每月 12000 次。

艾思奇⁽¹⁰⁾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0000 字。

陈伯达⁽¹¹⁾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周扬⁽¹²⁾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0000 字。

吕骥⁽¹³⁾同志：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蔡畅⁽¹⁴⁾同志：已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次。

董纯才⁽¹⁵⁾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8000 字。

吴老⁽¹⁶⁾：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以上共 149000 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需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 4000 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 12000 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做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注 释

[1] 荒煤，即陈荒煤（一九一三 —— 一九九六），原名陈光美，湖北襄阳人，作家、文艺批评家。当时任鲁迅艺术学院“战时文艺运动资料室”总负责人。

[2] 江丰（一九一〇 —— 一九八二），原名周玄福，上海人，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木刻家。当时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部长。

[3] 张庚（一九一一 —— 二〇〇三），原名姚禹云，湖南长沙人，戏剧理论家。当时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部部长兼戏剧系主任。

[4] 柯仲平（一九〇二 —— 一九六四），原名柯维翰，云南广南人，诗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校长。

[5] 范文澜（一八九三 —— 一九六九），字仲澐，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

[6] 邓发（一九〇六 —— 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7] 彭真（一九〇二 —— 一九九七），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

中央党校教育长。

[8] 王振之（一九一五 —— 一九八五），河北定县人，剧作家。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团长。

[9] 冯文彬（一九一一 —— 一九九七），浙江诸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0] 艾思奇（一九一〇 —— 一九六六），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哲学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11] 陈伯达（一九〇四 —— 一九八九），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惠安人，哲学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12] 周扬（一九〇八 —— 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文艺活动家。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13] 吕骥（一九〇九 —— 二〇〇二），原名吕展清，湖南湘潭人，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主任兼教务处处长。

[14] 蔡畅（一九〇〇 —— 一九九〇），湖南湘乡人，国际进步妇女运动活动家。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5] 董纯才（一九〇五 —— 一九九〇），湖北大冶人，教育家。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科长、边区师范学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国民教育科副科长等职。

[16] 吴老，即吴玉章（一八七八 —— 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延安大学校长。

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艺术*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

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在政治、军事这两门上我们比较会，当然还有毛病，但对这两门比较熟习一些。至于对经济、文化这两门，就不大熟习。我们也搞过经济，因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要能够打仗，首先要有饭吃，过去能够打仗，也是因为搞过一点经济。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说到老百姓，现在陕北还有一部分人

* 节选自《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目和序号一、二为本书编者所加。

吃得很差，还有许多人粮食不够，丰衣足食在边区还是一个目标，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但是去年这一年，生产走上了轨道，经济走上了轨道，这是大前提、新的东西。今年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中有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因为经济虽然走上了轨道，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还要继续学。

这次会议文化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边区的党部、政府甚至某些管理机关，如某些宣传机关，在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把文化教育问题提出来，还有同志不晓得在这些方面要做什么事情。比如县和区一级的宣传部，听说有的知道了，做得还好，有些就不晓得如何做。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用处也有一点，就是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能够把敌人打败，但是很大的用处就没有。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又不识字，又不会闹秧歌。现在秧歌也有一点，但如何普及还是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因此，经济、文化这两门不学会就不好。

在内战时期、抗战初期，甚至于现在，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还有一种思想，就是认为政治、军事是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样一种看法有没有理由呢？的

确，政治、军事是第一的，你不把敌人打掉，搞什么小米、大米，搞什么秧歌，都不成，因为还有敌人在压迫。在敌人压迫下，你还能搞什么学校，搞什么生产呢？所以打敌人当然是第一的。这样一来，做打敌人工作的人就有名誉，就吃得开，搞小米的人、搞秧歌的人就吃不大开，开会不会坐首席，选举主席团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把敌人打掉，搞小米、搞生产搞不起来，因此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个

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

来。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组织了变工队^①需要记账，组织合作社也需要记账，这就需要文化。一个村里组织变工队，至少要是有人能写村里人的名字。总之没有文化就不行。过去北伐时期，新军队比旧军队好，同建立黄埔军校^②就有关系。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其他军队就比不上。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现在我们的边区发展到怎样的情况呢？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现在我们是被拖住了脚，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比如不识字、不会算账，妨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更快地前进。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搞他十天八天，明年就会搞得好些。我们来一个五年计划，去年算一年，

今年是第二年，在这五年中间，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现在分别来说一说。

二

第三，关于艺术。

秧歌是一项，还有春联、歌曲、年画。

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³⁾，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这是我的设想，不是规定了的，同志们可以考虑。我想延安的知识分子在今年农历十月，应该纷纷开

会研究怎样下去调查和工作。杨家岭妇委的同志学纺纱，只学了两个星期，到了乡下妇女就欢迎得很。你不学这个本领，想要组织妇女，怎么行呢？你说你革命，那就要学本领。今年冬天，延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下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演秧歌、办冬学、办训练班、订按户计划等等，做三个月工作，真正学习本领。我看这些人要解放一下，每年都可以实行这个制度。这既可以作为放假旅行，又可以作为上边区课。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去了是要帮助群众，不要去妨碍群众。过去我们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碍人家纺纱，妨碍人家带娃娃。你们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边区有三十五万户，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也会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两个宣传部的同志要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写春联就要编几个本子，要搞新的春联。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课本。三十五万副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是也搞几个歌子来唱一唱呢？比如说搞他三五个歌子，使得一百四十万人民都能够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这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消灭文盲的办法，和春联的道理一样。此外还可以搞年画。

总之，我们的艺术要搞几样确实为老百姓所欢迎的东西。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群众艺术生活太贫乏了，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

志要从多方面努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变工队，是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中集体互助的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畜力，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

[2] 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帮助下，于广州附近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当时它是国共合作创办的军事学校。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但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他利用职权，到处排挤共产党人，培植自己的党羽，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终于把这个学校变成了反革命的组织。

[3] 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一文。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

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1)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

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2），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
刊印。

注 释

〔1〕 秦腔，陕西省的一种旧式歌剧。因为陕西在古代是秦国的地方，故称秦腔。

〔2〕 “欲速则不达”，孔子的话，见《论语》《子路》篇。

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节选自《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农民 —— 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 —— 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 —— 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 —— 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 —— 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所

* 节选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的第六小节。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
刊印。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

* 这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的第八小节。

五四运动^①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

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
刊印。

[1] 五四运动，见本书第 30 页《五四运动》和 54 页注释[3]。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月三十一日）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①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②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 本篇一、二节选自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第三节选自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二

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³⁾，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⁴⁾。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⁵⁾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⁶⁾，《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

他们。

三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⁷⁾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⁸⁾，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⁹⁾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

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延安整风，见本书第136页注释[3]。

[2] 文艺座谈会，指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集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这次会议习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讲话，见本书第八十八——一二三页。

[3] 《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写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一说是罗贯中作）。

[4]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三二），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四六九——前三九九），古希腊哲学家。

[5] 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6] 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主要谋士。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刘伯温，即刘基（一三一——一三七五），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受朱元璋礼聘参加起义军，提出时务十八策。明朝建立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7] 唐僧，指唐三藏，即玄奘（六〇二——六六四），唐代著名高僧。唐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前往印度研习佛教典籍，历经十余年

回国，译出佛经七十五部，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8] 蔡元培（一八八六 —— 一九四〇），浙江绍兴人，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写的一篇续，见上海复社 1938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

[9] 鲁迅，见本书第 13 页注释[2]。

为悼念冼星海题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毛 泽 东

根据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题词墨
迹选》刊印。

* 这是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举行的冼星海追悼会的题词。

注 释

[1] 冼星海（一九〇五 —— 一九四五），广东番禺人，作曲家。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曾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主任。一九四〇年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并学习。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病逝。主要作品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改造旧艺术 创造新艺术*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你们平剧院⁽¹⁾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²⁾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旧戏中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³⁾之类。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打仗也是个创造，但这是死了好多人换来的。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还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在以后二十年的战争中创造了打仗的新的方法。同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讲话的一部分。

样，我们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和干部，在各种工作中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前途是我们的。打败仗我们不怕，不打败仗我们就不知道仗应该是怎么打法。平剧这个剧种在延安曾有过很多的争论。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平剧的形式目前我们不忙改，只挑出若干需要修改的戏，首先从内容着手改造。过去在延安改造了两个戏，一个是《逼上梁山》⁽⁴⁾，一个是《三打祝家庄》⁽⁵⁾，缺点就是太长了。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恶虎村》这出戏应该把黄天霸改写成特务⁽⁶⁾。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国家组织第一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力量，第二是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政府是压制恶霸、土豪劣绅的。至于我们有个别干部欺压老百姓，也要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对他进行制裁，因为他是人民的罪人。

平剧在中国有很多人搞，国民党统治区那里有一摊子。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提高了，将来到了大城市，要把那些旧的戏剧团体接收过来，去领导他们。如果单靠演旧戏，我们自然演不过他们。如果在政治上不提高，那我们就领导不了他们。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平剧，即京剧。北京曾称北平，京剧亦称平剧。

[2] 孔明，即诸葛亮，一些取材于《三国演义》的传统剧目以他为主角。

[2] 《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讨鱼税》，戏曲传统剧目。主要剧情是，萧恩与女儿桂英打鱼为生，当地恶霸丁自燮勾结官府，勒索鱼税，滥施刑杖，父女被迫起而反抗，杀死恶霸全家，远走他乡。

[2] 《逼上梁山》，新编历史剧，中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于一九四三年集体创作，杨绍萱、齐燕铭等执笔，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主要内容是，北宋末年，高俅专权，内忧外患交织，饥民惨遭杀害，同情饥民的禁军教头林冲因遭高俅父子陷害，被迫投奔梁山义军。

[2] 《三打祝家庄》，新编历史剧，延安平剧院一九四四年集体创作，李纶、魏晨旭、任桂林执笔，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主要内容是，梁山宋江率军两次攻打祝家庄，因情况不明而失利，第三次攻打，改变了策略，派人打进庄去作内应，弄清了情况，联合庄内贫苦农户，里应外合，取得成功。

[2] 《恶虎村》，又名《江都县》、《三义绝交》，戏曲传统剧目。清代杨振纲根据小说《施公案》改编。主要内容是，清代江都县令施世纶升迁，路经恶虎村时，被庄主濮天雕、武天虬劫去。施世纶的护卫黄天霸与濮天雕、武天虬是盟兄弟，他借祝寿为名，入庄探明情况，当夜聚集同伙，杀死武天虬夫妇和濮天雕妻，逼死濮天雕，救出施世纶，并火烧了庄园。毛泽东看了晋绥平剧院演出团演出的《恶虎村》并提出修改意见后，晋绥平剧院曾对该剧作了改编的尝试。

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诸位代表们：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代表大会现在在北平^①召开，正值人民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时候。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②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

* 这个贺电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加写或改写的。

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现当你们的会议开幕之际，特向你们致贺，并祝你们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北平，即北京。

[2] “五四”新文化运动，见本书第30页《五四运动》和第54页注释[3]。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 这是《人民日报》报道的毛泽东讲话内容。

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题词墨
迹选》刊印。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瞿秋白^①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刊印。

注 释

[1]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于党中央领导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

（一九五一年）

中国戏曲研究院^{〔1〕}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2〕}。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戏曲研究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正式成立，前身最早是延安平剧研究院。

〔2〕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曾发表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题词“推陈出新”。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①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②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

^{*} 节选自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刊印。

注 释

[1] 武训，原名武七（一八三八 —— 一八九六），清末山东堂邑县（今聊城西）人。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以通过乞讨、放高利贷等方式聚集钱物，举办“义学”而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被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

[2] 鸦片战争，见本书第 53 页注释[1]。

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党组和文艺团体的党组：

(一)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¹⁾，认为这一报告是正确的。

(二)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三)中央这一指示和中央宣传部

的报告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并可给党外同情分子阅看。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个报告，在分析两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时指出：特别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各同志：

驳俞平伯⁽¹⁾的两篇文章⁽²⁾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

* 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俞平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浙江德清人。著有《红楼梦简论》、《红楼梦研究》等。《红楼梦简论》发表于《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一九二三年初版，一九五二年九月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

2 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后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第十八期上转载。《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

关于文风问题*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一

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二

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

* 选自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本篇一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按语。本篇二是《一个整社的好经验》的按语。本篇三是《合作社的政治工作》的按语。

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 一文按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 这是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写的一篇按语。《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武店镇农民、中共党员陈学孟带头办起本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积极帮助其他群众办社的事迹。

民族的好的东西要恢复 并搞得更好*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①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②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 节选自《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谈话的一部分）。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二

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3〕}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注 释

〔1〕 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的五位妇女。

〔2〕 东晓市，北京旧货集市。

〔3〕 杨士惠（一九一——一九八七），北京市人，象牙雕刻艺术家。曾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二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21]。“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 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的第五点。本篇二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的一部分。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二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²⁾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³⁾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⁴⁾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⁵⁾、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

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一九九〇年第三期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是“百家争鸣”。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这次讲话，正式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

[2] 指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 杜威(一八五九 —— 一九五二)，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

[4] 胡适，见本书第 23 页注释[10]。

[5] 李森科(一八九八 —— 一九七六)，农学家，苏联生物学中李森科学派的创始人。曾任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反对遗传学基础的基因理论。排斥、压制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曾对中国农业及相关领域产生了不良影响。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¹⁾，打到三八线⁽²⁾]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 这是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

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³⁾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⁴⁾，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

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理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⁵⁾。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艺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

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⑥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

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⁷⁾。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⁸⁾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⁹⁾，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

鲁迅^⑩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⑪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

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一门⁽¹²⁾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¹³⁾，也要《阿 Q 正传》⁽¹⁴⁾。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¹⁵⁾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¹⁶⁾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¹⁷⁾。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

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⑧。“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

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注 释

[1] 抗美援朝，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侵入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帮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2] 三八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

[3]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

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4] 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解散。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他的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6] 桐城派，是古文中的一个流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由于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把他们和他们这一派的人称为桐城派。这一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

[7]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考虑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由于资本家阶级一般地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设想没有能行得通。

[8]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9] 八股文，参看本书第29页注释[1]。

[10] 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释[2]。

[11] 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七六二），公元七一二至七五六年在位。

[12] 孔子设立的六门课程（即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孔子，见本书第14页注释[4]。

[13] 《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创作的长篇小说。

[14] 《阿Q正传》，鲁迅小说的代表作。

[15] 《毁灭》，见本书第23页注释[6]。

[16] 西太后，即叶赫那拉氏（一八三五—一九〇八），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一八六一年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因住在西宫，所以又称西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同时又盲目地排外。一八九八年，她镇压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运动。

[17] 隋朝的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据《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唐朝的十部乐是：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其中，龟兹、康国、安国、疏勒、高昌都属于西域，高丽即朝鲜，天竺即印度。

[18]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是由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提出的。他在《劝学篇·设学》中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作为维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

* 节选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¹⁾，达尔文的进化论⁽²⁾，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

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

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

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哪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

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哥白尼（一四七三年 —— 一五四三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数千年来地球不动的学说。

[2] 达尔文（一八〇九年 —— 一八八二年），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你们的会议开了几天？开得怎样？汇集的那三十三个问题⁽¹⁾，我都看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提出作家对官僚主义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官僚主义当然应该批评。有个电影叫《荣誉属于谁》，里面有一个铁路局长，是个官僚主义者，可是他的局长还照样当，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学习。这部电影里那样写这个局长，叫做不彻底，缺乏彻底性，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²⁾，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³⁾，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少一点才好；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来问题很多。要求答复，一个人怎么答复得了？我看还是大家自报公议，一个人念，大家讨论，大家答复。

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

当然还要有帮助。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赞成的，有勉强赞成的。对改变社会制度也是这样，比如民族资产阶级，你把他的生产资料拿来共产了，他心甘情愿吗？总有些勉强，当然也有不大勉强的。改变社会制度，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几亿人口，总有勉强的。

总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迫于全中国的大势所趋，有些人不得不勉强赞成。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我国过去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打倒以后，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几亿人口的小资产阶级，要改变所有制。知识分子，按出身说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当然还有大、中、小的区别。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如果说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识分子，那就有六百万人。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都是进过大学的，萧楚女⁽⁴⁾就什么正规学校也没有进过，他是靠自学的，也是知识分子。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用来指导行动。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算是懂得马克思主义。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艺界有多少这样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还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其中有些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不只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但他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他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这样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这些人多数不说话，沉默地抵抗。恐怕这两头都没有十分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挂名的不算，教条主义的不算，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条主义的，人家不要看。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

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人还是不自觉的，没有经过锻炼。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

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⑤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⑥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苏联那时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可见这一点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在知识分子中占十分之一——五十万，有没有这么多？不信的，那么多，这不能强迫。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

鲁迅^⑦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

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上次我曾讲了薛仁贵⁽⁸⁾、孙行者的事。薛仁贵害了病，打胜仗，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我看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有，张士贵⁽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有。

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学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中学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

不要他们要谁呢？这些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是我們有没有信心。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谈。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⁰⁰，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⁰⁰。我对他描写喝茶的人有些兴趣，他的文章说在那里喝茶的群众不会喝茶，可是他们还喝得很有一股劲。他还批评这个茶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有缺点，这个批评是对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经过公私合营与合

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以后应当整顿。但是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⑫，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看得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文艺作品，总是要写点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关系。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写写申新九厂，写写那个资本家荣毅仁^⑬，你要写荣毅仁，就得写他跟工人的关系。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大个国家总会有这些人的，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他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可以出他的书。

体验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给知识分子。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去体验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灾难，特别是有名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就怕你来调查我什么，我就是不告诉你。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你。有些地方“记者成灾”。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④的《典论·论文》和曹植^⑤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⑥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⑦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大家反映作家职业化后，有些书因纸张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来，影响作家的生活。作家协会能不能自己搞个印刷厂？拨一些机器给你们，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学家的著作，一时不能印出来，他们还有大学和科学院发的薪金可以维持生活。作家则不同，他们是靠版税稿费生活，若是书籍杂志没有纸张印不出来，他们没有稿费收入，就无法生活。我说作协自己办一个印刷厂，当然不是要老舍、巴金^⑧先生去办，而是周扬、沈雁冰^⑨他们筹划去办。

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们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赵丹^⑩，孙瑜^[21]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

嘛，总该写好它。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你们回去就传达，就要贯彻，不要等三中全会^[22]作决定。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的《封神演义》^[23]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24]，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咏》^[24]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

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

[2]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3]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4] 萧楚女，见本卷第248页注[4]。

[5] 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6]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的音译。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拉普”，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7] 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释[2]。

[8] 薛仁贵（六一四——六八三），即薛礼，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将军。

[9] 张士贵（？——约六五六），本名忽崱，虢州卢氏（今属河南）人，唐代将军。

[10] 王蒙，一九三四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平（今北京），作家。当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三区（东四区）委员会工作。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错误批评。

[11] 姚雪垠（一九一〇——一九九九），河南邓州人，作家。当时在武汉市作家协会工作。

[12] 姚文元，一九三一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工作。

[13] 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14] 曹丕（一八七——二二六），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国时期文论家、诗人。

[15]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

[16] 韩愈，见本书第87页注释[9]。

[17] 萧统（五〇一——五三一），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公元五〇二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编有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人习称《昭明文选》。

[18]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市人，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一九〇四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 周扬（一九〇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一九九六——一九八一），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当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20] 赵丹（一九一四——一九八〇），山东肥城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曾主演电影《武训传》。

[21] 孙瑜（一九〇〇——一九九〇），四川自贡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22] 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在北京举行。

[23] 《封神演义》，明代许仲琳编辑的长篇小说（一说作者为陆西星），共一百回。

[24] 《草木篇》，流沙河写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号。

[25] 《吻》，臼白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号。

片面性问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第六点。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¹⁾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

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注 释

- [1] 鲁迅，见本书第 13 页注释[2]。

“放” 还是 “收” ?*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放” 还是 “收” ?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第七点。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

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

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

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

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¹⁾，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²⁾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注 释

[1] 范仲淹（九八九 —— 一〇五二），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吴县市）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的两首词指《苏幕遮》和《渔家傲》。《苏幕遮》原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渔家傲》原词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2] 李讷，一九四〇年生，毛泽东之女。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

(一九五八年八月)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¹⁾的有教无类，孟子⁽²⁾的民贵君轻，荀子⁽³⁾的人定胜天，屈原⁽⁴⁾的批判君恶，司马迁⁽⁵⁾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⁶⁾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⁷⁾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的文字。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注 释

[1] 孔子，见本书第14页注释[4]。

[2] 孟子（约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

[3] 荀子（约公元前三二五——前二三八），名况，字卿，战国末期哲学家、教育家。

[4] 屈原（约公元前三三九——约前二七八），名平，字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

[5] 司马迁（公元前一四五或公元前一三五——？），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6] 王充（二七——约九七），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哲学家。范缜（约四五〇——约五一五），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南朝齐、梁时期无神论思想家。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张载（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宋哲学家。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哲学家。

[7] 关汉卿（约一二二〇——约一三〇〇），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剧作家。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吴承恩（约一五〇〇——约一五八二），字汝忠，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明代小说家。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名霑，字梦阮，满洲正白旗人，清代小说家。

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¹⁾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²⁾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³⁾曰：人

* 这是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的批注。

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二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⁴⁾

三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⁵⁾，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⁶⁾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⁷⁾

五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⁸⁾

六

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⁹⁾

七

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¹⁰⁾

八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错误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¹¹⁾

九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¹²⁾

十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之国：都城。不是 State，也不是 Country。

⁽¹³⁾

十一

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¹⁴⁾

十二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¹⁵⁾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刊印。

注 释

[1] 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释[2]。

[2] 引用的鲁迅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壁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唐宋传奇集》上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下册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

[3] 陆放翁，即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击水”的批注。

[5]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又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6] 这是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心潮”的批注。

[7]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的批注。《菩萨蛮》，指《菩萨蛮·黄鹤楼》。

[8] 这个批注写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那一页的天头上。以下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9]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长征》一诗中“水拍”、“三军”的批注。

[10]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苍龙”的批注。

[11] 这是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一词的批注。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首次发表的这首词和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本词下阕的第八句作“一截留中国”，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

[12]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雪》一词的批注。末三句，指这首词的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3]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三十一年还旧国”一句的批注。

[14] 这是毛泽东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批注。其中所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一典有误。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对“武昌鱼”的注释是：“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鮰鱼，称团头鲂或团头鲂。”

[15] 这是毛泽东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的批注，指“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 争取的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陆定一⁽¹⁾同志：

建议将此件⁽²⁾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六五期刊载的一个材料的批示。

注 释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六五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材料指出，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的党员在讨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反映出一些不正确认识，表现在：（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时更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这个党支部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清华大学党委及时发现并检查纠正了这些错误做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语和清华大学的材料。

骚体有民主色彩， 属于浪漫主义流派*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

—

此篇⁽¹⁾ 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²⁾ 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比首。屈原⁽³⁾ 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⁴⁾、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與入羣，命日蹶痿之机。

* 节选自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和枚乘《七发》，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印发。毛泽东在文中还说：“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⁵⁾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

二

“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溲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

三

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⁶⁾时为吴王刘濞⁽⁷⁾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

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⁸⁾所收曹植⁽⁹⁾《七启》，张协⁽¹⁰⁾《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指枚乘《七发》。枚乘（公元前？前四〇），淮阴（今属江苏）人，西汉辞赋家。有赋九篇，今存三篇，《七发》为其中一篇。作者假托楚太子有病，有吴客探问，指出安居内宫、享乐过度的弊害，并叙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七事，予以启发，终使太子感动而出汗，病即痊愈。《七发》为汉代大赋的前驱，对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以后作品中沿用这种体式的，统称为“七体”，或简称“七”。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倡议，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

[2] 骚体，亦称“楚辞体”，属辞赋类。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离骚》为代表。

[3] 屈原，见本书第 238 页注释[4]。

[4] 宋玉，生卒年不详，字子渊，郢（今湖北江陵）人。战国时期楚国辞赋家。景差，生卒年、籍贯不详，战国时期楚国辞赋家。贾谊（公元前二〇〇——前一六八），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5] 巴夫诺夫，今译巴甫洛夫（一八四九——一九三六），苏联生理学家。

[6] 汉文帝，指西汉皇帝刘恒（公元前二〇二——前一五七），公元前一八〇年至前一五七年在位。

[7] 刘濞，（公元前二一五 —— 前一五四），西汉诸侯，封吴王。

[8] 《昭明文选》，参见本书第 223 页注释[17]。

[9] 曹植，见本书第 223 页注释[15]。

[10] 张协（？ —— 三〇七），字景阳，安平（今属河北）人，西晋文学家。

谈《红楼梦》*

(一九五九年 —— 一九七三年)

—

《红楼梦》^①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②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刊印

* 本篇一、二节录自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本篇三节录自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本篇四节录自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五节录自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本篇六节录自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本篇七节录自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同科学工作者的谈话。本篇八节录自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的谈话。

二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三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

他⁽³⁾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你们看过《金瓶梅》⁽⁴⁾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产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

《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⁵⁾是尊重女性的。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四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⁶⁾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刊印

五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⁷⁾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⁸⁾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⁹⁾使人爱看。《金瓶梅》

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刊
印

六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¹⁰⁾，《好了歌》和注⁽¹¹⁾。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¹²⁾，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¹³⁾，又出了个吴世昌⁽¹⁴⁾。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

对一点。⁽¹⁵⁾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刊印

七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¹⁶⁾手里衰落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刊印

八

许世友⁽¹⁷⁾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¹⁸⁾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

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刊印。

注 释

[1] 《红楼梦》，见本书第23页注释[7]。

[2][11] 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3][18] 指《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见本书第192页释[7]。

[4] 《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

[5] 《聊斋志异》，见本书第9页注[4]。

[6] 乾隆，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一七一—一七九九），一七三五年至一七九六年在位，年号乾隆。

[7] 《官场现形记》，清末李宝嘉的长篇小说。

[8] 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2]。

[9] 《西游记》，见本书第8页注(3)。

[10] 即《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2] 俞平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作家、学者。所著《红楼梦研究》，为“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王昆仑（一九〇二—一九八五），原籍江苏无锡，生于河北，政治活动家，并从事《红楼梦》研究，著有《〈红楼梦〉人物论》。

[13] 何其芳（一九一二—一九七七），四川万县人，诗人，文学评论家。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红楼梦》时，将他写于一九五六年《论〈红楼梦〉》节要作为代序。

[14] 吴世昌（一九〇八—一九八六），字子臧，浙江海宁人，

文学史家。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有《〈红楼梦〉探源》(英文本)、《〈红楼梦〉探源外编》。

[15] 对《红楼梦》及相关课题的研究,称为“红学”。自清代至民国初年的著述,被称为“旧红学”。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被称为“旧红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一九二一年,胡适发表长文《红楼梦考证》,注重用历史的方法,依据可靠的材料,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及家世、写作年代和版本等,被称为“新红学”的开创之作。

[16] 雍正,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一六七八—一七三五),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三五年在位,年号雍正。

[17] 许世友(一九〇六——一九八五),湖北麻城许家洼(今属河南新县)人。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毛泽东谈话后的第二天,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

* 这是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刊印。

《词六首》引言*

(一九六二年四月)

这六首词，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起来，要求发表，⁽¹⁾ 因以付之。回忆了一下，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五月号发表《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六首词写的引言。该期《人民文学》刊发了作者这个引言稿的一则较短说明：“这六首词，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是否有无讹误，也不知您是否愿意将其发表，或者是不是还需要修改，因此抄寄一份给您，请您指示，并请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

《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

(一九六二年五月)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¹⁾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²⁾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³⁾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⁴⁾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⁵⁾，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⁶⁾，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

* 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准备在五月号发表毛泽东的词六首，郭沫若应约于五月一日撰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五月九日，郭沫若将这篇文章的清样送毛泽东审改。毛泽东阅后将这篇文章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段话全部删去，重新写了本篇的文字。

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 and 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刊印。

注 释

[1] 即毛泽东一九三五年二月作的《忆秦娥·娄山关》。全词为“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五十二页）

[2] 指一九六二年二月初在广州召开的诗歌座谈会。

[3] 指毛泽东。

[4] 过去有一种说法，遵义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召开的。后来，经过考证确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这样，中央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应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而不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后。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5] 刘湘（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四川大邑人。一九三三年任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三四年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

对《毛主席诗词》 若干词句的解释*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¹⁾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二、“到中流击水”⁽²⁾。

“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那时有个因是子（蒋维乔⁽³⁾），提倡一种静坐法。

三、“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⁴⁾

“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

*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了口头解释。这是英译者对毛泽东的解释所作记录的要点。

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

四、“一枕黄粱再现”⁽⁵⁾。

指军阀的黄粱梦。

五、“国际悲歌歌一曲”⁽⁶⁾。

“悲”是悲壮之意。

六、“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⁷⁾

“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帮我们忙。“枪林逼”也是指自己这边。“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是倒装笔法，就是：“飞将军自重霄入，枪林逼。”

七、“莫道君行早”⁽⁸⁾。

“君行早”的“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八、“离天三尺三”⁽⁹⁾。

这是湖南常德的民谣。

九、“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¹⁰⁾

这首词上下两阕不是分写两次攻打娄山关，而是写一次。这里北有大巴山，长江、乌江之间也有山脉挡风，所以一二月也不太冷。“雁叫”、“霜晨”，是写当时景象。云贵地区就是这样，昆明更是四季如春。遵义会议⁽¹¹⁾后，红军北上，准备过长江，但是遇到强大阻力。

为了甩开敌军，出敌不意，杀回马枪，红军又回头走，决心回遵义，结果第二次打下了娄山关，重占遵义。过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

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¹²⁾把山比作“细浪”、“泥丸”，是“等闲”之意。

十一、“天若有情天亦老”⁽¹³⁾。

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¹⁴⁾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

十二、“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¹⁵⁾

是指渔船不见。

十三、“泪飞顿作倾盆雨”⁽¹⁶⁾。

是指高兴得掉泪。

十四、“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¹⁷⁾人坐在地球这颗行星上，不要买票，在宇宙里旅行。地球自转的里数，就是人旅行的里数。地球直径为一万二千七百多公里，乘以圆周率，即赤道长，约四万公里，再折合成华里，约八万里。人在二十四小时内走了八万里。

十五、“牛郎欲问瘟神事”⁽¹⁸⁾。

牛郎织女是晋朝人的传说。

十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¹⁹⁾“红雨”指桃花。写这句是为下句创造条件。“青山着

意化为桥”，指青山穿洞成为桥。这两句诗有水有桥。

十七、“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黑手高悬霸主鞭。”^[20]

“咒逝川”、“三十二年前”，指大革命失败，反动派镇压了革命。这里的“霸主”，就是指蒋介石。

十八、“冷眼向洋看世界”^[21]。

“冷眼向洋”就是“横眉冷对”。

十九、“云横九派浮黄鹤”^[22]。

“黄鹤”不是指黄鹤楼。“九派”指这一带的河流，是长江的支流。明朝李攀龙^[23]有一首送朋友的诗《怀明卿》：“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李攀龙是“后七子”之一。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24]不好，《明诗别裁》^[25]好。

二十、“浪下三吴起白烟”^[26]。

“白烟”为水。

二十一、“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27]
陶渊明设想了一个名为桃花源的理想世界，没有租税，没有压迫。^[28]

二十二、《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

“友人”指周世钊。^[29]

二十三、“九嶷山上白云飞”^[30]。

“九嶷山”，即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

二十四、“红霞万朵百重衣”^[31]。

“红霞”，指帝子衣服。

二十五、“洞庭波涌连天雪”^[32]。

“洞庭波”，取自《楚辞》中的《九歌·湘夫人》^[33]：“洞庭波兮木叶下”。

二十六、“长岛人歌动地诗”^[34]。

“长岛”即水陆洲，也叫橘子洲，长沙因此得名，就像汉口因在汉水之口而得名一样。

二十七、“芙蓉国里尽朝晖”^[35]。

“芙蓉国”，指湖南，见谭用之诗“秋风万里芙蓉国”^[36]。“芙蓉”是指木芙蓉，不是水芙蓉，水芙蓉是荷花。谭诗可查《全唐诗》。^[37]

二十八、“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38]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

二十九、“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39]

郭沫若原诗^[40]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三十、“蚂蚁缘槐夸大国”^[41]。

“大槐安国”是汤显祖^[42]《南柯记》里的故事。

三十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43]“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丈冰”，而现在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三十二、“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44]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注 释

[1][2] 见《沁园春·长沙》（《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3] 蒋维乔（一八七三—一九五八），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从事文学、历史、哲学研究，也精于养生学。曾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4] 见《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5] 见《清平乐·蒋桂战争》（《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6] 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7] 见《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8] 见《清平乐·会昌》（《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

[9] 见《十六字令·三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9 页）。

[10] 见《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2 页）。

[11] 遵义会议，见本书第 264 页注释[4]。

[12] 见《七律·长征》（《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5 页）。

[13] 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4 页）。

[14] 李贺（七九〇——八一六），字长吉。福昌（今属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出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15] 见《浪淘沙·北戴河》（《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2 页）。

[16] 见《蝶恋花·答李淑一》（《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0 页）。

[17][18][19] 见《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4 页）。

[20] 见《七律·到韶山》（《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0 页）。

[21][22][26][27] 见《七律·登庐山》（《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3 页）。

[23] 李攀龙（一五一四——一五一〇），字于鳞，号沧溟，山东济南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代文学家。与明嘉靖、隆庆时期的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为“后七子”。他们继承“前七子”（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贞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的复古主张，曾对文学界产生过不良的影响。

[24] 《明诗综》，清代朱彝尊编选，共一百卷。录存明代至明亡后遗民共三千四百余人的诗作。

[25] 《明诗别裁》，清代沈德潜、周准从《明诗综》选录一千余首

编辑而成，共十二卷。

[28] 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属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曾作《桃花源记》，写秦时有些人逃到一个偏僻宁静的桃花源避乱，与世隔绝，过着和平的劳动生活，直到晋朝才有一个武陵的渔人因迷路偶然找到这个地方。

[29] 周世钊（一八九七——一九七六），字惇元。湖南宁乡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同学，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30][31][32][34][35] 见《七律·答友人》（《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33] 《楚辞》，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作章句。共收入屈原等人的辞赋十七篇。《九歌·湘夫人》是其中屈原的一篇。

[36] 谭用之，字藏用，生卒年、籍贯不详，五代诗人。他的《秋宿湘江遇雨》一诗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37] 《全唐诗》，清代彭定求等编，共九百卷，收入唐代、五代诗歌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残句一千余句。

[38] 见《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39] 见《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40]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述收入《郭沫若全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原诗，指《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41][43][44] 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42] 汤显祖（一五五〇——一六一六），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明代戏曲文学家。作有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一名《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五种。

关于“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定一⁽¹⁾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七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来信的批示。该信希望对“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引起重视。沿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收入本篇采用的题目。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¹⁾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 **Model**⁽²⁾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

*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上写的批语。信中说，从废除模特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不少困难。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继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并党中央的信上的批语。张继春在信中说：要画人体补血时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是不一定要从社会上雇请，可考虑用别地办法代替。沿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收入本片一律采用的题目。

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刊印。

注 释

[1] 定一，即陆定一（一九〇六——一九九六），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恩来，即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Model，英语单词，汉语一译“模特儿”。

[3] 徐悲鸿（一八八四——一九五三），江苏宜兴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4] 齐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三），明璜，字频生，号白石，湖南湘潭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五日)

—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同江青的谈话。本篇三是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对电影《创业》的编剧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来信对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当时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批判《创业》，指责它“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罗列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重新上映该片。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批示前后，还对文艺界人士的几封来信作了批示。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对张春桥转报的谢革光希望《诗刊》复刊给《红旗》杂志社的信批示：“同意。”七月二十五日，电影《海霞》主创人员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来信，反

二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¹⁾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²⁾、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³⁾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⁴⁾，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

映文化部为批判《海霞》，决定按修改前的片子上映，新改的镜头律不用。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决定按修改过的片子上映。十月三日，毛泽东对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希望演出、广播、出版《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以纪念冼星海逝世四十周年的来信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十月二十五日，首都音乐界在北京举办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周海婴要求编辑出版鲁迅书信集等的来信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对姚雪垠表示下决心将《李自成》五卷写完并希望将第二卷的出版问题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二卷、三卷至五卷。”这里沿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收入本篇二、三采用的题目。

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⁵⁾，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⁶⁾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⁷⁾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⁸⁾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⁹⁾、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¹⁰⁾。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刊印。

三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 泽 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新人所在单位。

根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鲁迅，见本书第 13 页注释[2]。

[2] 胡适，见本书第 23 页注释[10]。创造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成立，成员多是留学日本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浪漫主义。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太阳社，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在宣传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三〇年春全部成员加入左联。新月社，新诗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强调诗的艺术美，使新诗在艺术技巧上得到丰富和提高。但某些成员反对革命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该社停

止活动。

[3] 周扬（一九〇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而长期关押。毛泽东这次谈话后不久，周扬即被放出。

[4] 《红楼梦》，见本书第23页注释[7]。《水浒》，见本书第162页注释[3]。

[5]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6] 《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一九五五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毛泽东一九六四年观看了演出，肯定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经反复加工修改，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

[7] 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曾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杜林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批判。一八七七年，杜林因公开指责柏林大学物理系教授赫尔姆霍茨，被取消了讲师资格。

[8] 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

[9] 孔夫子，即孔子。见本书第 14 页注释[4]。

[10] 廖耀湘（一九〇六 —— 一九六八），湖南邵阳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全军覆没后被俘。

读谢灵运《登池上楼》批语*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

此人⁽¹⁾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²⁾是造反的檄文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刊印。

* 这个批语写在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古诗源》（清代德潜编选）中谢灵运《登池上楼》旁。《登池上楼》全诗为：“潜曲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是力不任。徇操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耳验波，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园柳变鸣育。祁祁伤歌，姜姜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海处心。持操岂独古，无网征在今。”

注 释

[1] 指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宋诗人。在刘宋朝先后任太子左卫率、侍中，后任临川内史，因游山玩水遭弹劾，朝廷派人捉捕，他起兵造反。后被捉捕，流放广州，被杀。

[2] 这是谢灵运起兵造反时写的诗，见《宋书·谢灵运传》。《古诗源》未收这首诗。

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批语*

是去交趾（安南^①）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②，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③年应有二十

* 这个批语写在丛雅居重刊星渚项氏本《初唐四杰集》（清代项家达编）中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旁。《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全文为：“上元二载，高旻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海气近而苍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川涂所亘，郢路极于峭潼；风壤所交，荆门泊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寮案尽鸛鸾之选。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披鹤雾，陟龙门。故人握手，新知满目。饮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接衣簪于座右，驻旌荣于城隅。临风云而解带，眄江山以挥涕。岩楹左峙，俯映玄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萍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芝兰而涵晚液。舫仙舟于石岸，荐绮席于沙场。宾友盛而芳梅满，林塘清而上筵肃。琴歌迭起，俎豆骈罗。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情盘乐极，日暮途遥。思染翰以凌云，愿麾戈以留景。嗟乎！素交为重，觉老幼之同归；朱娥傥来，岂荣枯之足道。且欣风物，共悦濠梁。齐天地于一指，混飞沉于一贯。嗟乎！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怅南溪之路。请扬文笔，共记良游。人赋一言，偶成四韵云尔。”

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⁴⁾，是二十岁⁽⁵⁾。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⁶⁾说年二十八，《新唐书》⁽⁷⁾说二十九⁽⁸⁾，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⁹⁾、四川之梓州⁽¹⁰⁾一带、河南之虢州⁽¹¹⁾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¹²⁾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做过沛王李贤⁽¹³⁾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¹⁴⁾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时，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路当时体，……不废江网万古流”⁽¹⁵⁾，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¹⁶⁾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¹⁷⁾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¹⁸⁾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

弼^[19]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20]死时二十七，夏完淳^[21]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22]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刊即

注 释

[1] 安南，即越南。

[2] 寿州，唐时辖境大致为今安徽淮南、寿县、六安、霍山、霍邱等市县。

[3] 勃，即王勃（六五〇——六七六），字子安，绛州龙门（今

山西河津)人。唐代文学家。

[4] 《曲礼》，《礼记》中的一篇，记载春秋前后贵族饮食、起居、丧葬等各种礼制的细节

[5] 此处手稿为“二十四岁”。

[6] 《旧唐书》，纪传体唐代史，共二百卷。后晋刘昫监修，张昭远、贾纬等撰。原名《唐书》，为与欧阳修等所撰的《新唐书》区别，称《阳唐书》。

[7] 《新唐书》，纪传体唐代史，共二百二十五卷。宋代欧阳修、宋祁等撰。

[8] 王勃《〈春思赋〉序》说：“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杨炯《〈王子安集〉序》说：王勃先谢，“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据此，王勃卒年为二十七岁。

[9] 绛州，唐时辖境大致为今山西曲沃、稷山、新绛、绛县、翼城、垣曲、闻喜及侯马等市县。长安，唐时位置在今西安城南。

[10] 梓州，唐时辖境大致为今四川三台、中江、盐亭、射洪一带。

[11] 虢州，唐时辖境大致为今河南西部包括灵宝市、栾川以西、伏牛山以北等地。

[12] 《唐摭言》，又称《摭言》，笔记小说集，记叙唐代官吏、士人轶闻，共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太平广记》，小说集，共五百卷，另目录十卷。北宋李昉等编辑。

[13] 李贤(六五三——六八四)，名德，字明允，唐高宗李治之子，曾被封为潞王、沛王、雍王。

[14] 李治(六二八——六八三)，即唐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年)即位。

[15] 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属河南)，唐代诗人。他的《戏为六绝句》有一首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为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16] 初唐四杰，指唐代初期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17] 此处手稿为“王逸”，应为王弼。王弼(二二六——二四九)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三国时期玄学家。

[18] 贾谊，见本书第249页注释[4]。

[19] 此处手稿为“王逸”。

[20] 李贺，见本书第 271 页注释[14]。

[21] 此处手稿为“夏淳融”，应为夏完淳。夏完淳，原名夏复（一六三一——一六四七），字存古，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南明抗清将领、诗人。

[22] 末尾略有删节。

读白居易《琵琶行》 及序文批语*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¹⁾作者⁽²⁾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刊印。

* 这个批语写在中华书局印行的《注释唐诗三百首》（清代蘅塘退士编）中白居易《琵琶行》的序文旁。《琵琶行》序文为：“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注 释

[1] 《琵琶行》中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指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邳（今陕西渭南），唐代诗人。曾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曾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尚书。

读《西游记》批语*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①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刊印。

* 这个批语写在光绪辛卯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明代吴承恩著）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一段文字旁。这段文字是：“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遂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枪刀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

注 释

- [1] 吴承恩，见本书第 238 页注释[7]。

读《聊斋志异》批语*

一

表现作者⁽¹⁾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二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刊印。

* 本篇一、二分别写在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聊斋志异》(清代蒲松龄著)中《白莲教》和《小谢》两篇开头的文字旁。《白莲教》写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运用法术迷惑、发动农民群众造反的故事。《小谢》写陶生和小谢、秋容两个女鬼从相互爱慕、救助到最后结合的故事。

注 释

[1] 指蒲松龄(一六四〇——一七一五)，字留仙，山东淄川(今属淄博)人，清代小说家。

第二辑

致何香凝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香凝⁽¹⁾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年，及《双清词草》⁽²⁾，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³⁾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⁴⁾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

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
健康！

毛 泽 东上

六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香凝，即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原名何谏，又名何瑞谏，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 《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一九二八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 承志，即廖承志（一九〇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 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名弃疾，字稼轩，号亚子，江苏吴江人。国民党左派，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画，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

致 刘 雪 苇^{*}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收到了⁽¹⁾，谢谢！

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²⁾，很欢喜。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 这一复信写在刘雪苇的来信上，没有抬头。

注 释

[1] 指刘雪苇给毛泽东的信和转交的《七月》杂志。刘雪苇(一九一二——一九九八)，又名孙雪苇，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文学评论家。当时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汉口《七月》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嘱分赠一本给你现特转上，祈查收。”

[2] 指《七月》半月刊在这期登载的题为《宣传、文学、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记录。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胡风、聂绀弩、吴组湘、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吴奚如、池田幸子。

致 萧 三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子璋⁽¹⁾同志：

(一)大作⁽²⁾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³⁾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 泽 东

六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萧三(一八九六——一九八三)，原名萧子章，湖南湘乡人，诗人。当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

[2] 指萧三写的一本诗稿。其中一部分诗后来收入他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萧三诗选》。

[3] 指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日在延安举行的“世界革命文豪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参与者有延安各文化团体的人员和青年学生等。毛泽东因故未出席。

致 周 扬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周扬⁽¹⁾同志

文章⁽²⁾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³⁾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

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当，还请斟酌。

作文⁽⁴⁾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 泽 东

十一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扬，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

[2] 指周扬撰写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该文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3] 鲁迅，见本书第13页注释[2]。

[4] 指毛泽东准备撰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就此题目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演讲。这篇演讲登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致 周 文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周文^{〔1〕}同志：

群众报^{〔2〕}及《大众习作》^{〔3〕}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

敬礼！

毛 泽 东

十一月三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周文(一九〇七——一九五二)，四川荣经人。当时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

www.mzdbl.cn

[2] 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它是延安大众读物社一九四〇年三月创办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3] 《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社一九四〇年八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致 萧 三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萧三^{〔1〕}同志

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2〕}。有暇望来谈。此致

敬礼

原件还你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萧三，当时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

〔2〕 抗战时期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诗作者把自己的诗作贴在（或写在）大街的土墙上、石头上、树干上等，在群众中朗诵。萧三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致 刘 雪 苇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雪苇⁽¹⁾同志：

来信及提纲⁽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此复。致以敬礼！

毛 泽 东

七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刘雪苇，一九一二年生，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2] 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第一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一九四八年五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致 萧 军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

萧军^①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敬问

近好！

毛 泽 东

八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www.mzdbl.cn

注 释

[1] 萧军（一九〇七——一九八八），原名刘鸿霖，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致 萧 军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

萧军^{〔1〕}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2〕}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彦^{〔3〕}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 泽 东

八月十二日早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萧军，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2〕 罗，指罗烽（一九〇九——一九九一），原名傅乃琦，辽宁

沈阳人，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舒，指舒群（一九一三 —— 一九八九），原名李书堂，黑龙江哈尔滨人，作家。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3] 艾青（一九一〇 —— 一九九六），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诗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致 欧 阳 山

(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

欧阳山^{〔1〕}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叙，并盼与草明^{〔2〕}同志偕来。此致
敬礼！

毛 泽 东

四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欧阳山（一九〇八——二〇〇〇），原名杨凤岐，笔名凡鸟、罗西等，湖北江陵人。作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2〕 草明（一九一三——二〇〇二），原名吴绂文，广东顺德人，作家。当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致欧阳山、草明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

欧阳山⁽¹⁾
草明 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

*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也给萧军、罗烽、艾青等写了同样意思的信。据艾青回忆，在这之前毛泽东写信给他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与艾青谈了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接到四月十三日的信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不日毛泽东回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艾青对文章进行了修改，五月十五日以《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又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回信说：“来信收到，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不知你意如何？此致敬礼！”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可惜的是，艾青保存的毛泽东给他的这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遗失了。参见艾青《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

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 泽 东

四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欧阳山（一九〇八——二〇〇二），作家。一九四一年九月起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二年二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草明（一九一三——二〇〇二），广东顺德人，作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致欧阳山、草明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

欧阳山⁽¹⁾
草明 二同志：

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见本书第 315 页注释[1]。

致 罗 烽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

罗烽⁽¹⁾同志：

你的文章⁽²⁾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³⁾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 泽 东

六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罗烽（一九〇九——一九九一），原名傅乃琦，奉天盛京（今辽宁沈阳）人，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2] 指罗烽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其中《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延安《文艺月报》第七期。

[3] 高尔基，见本书第 23 页注释[12]。

致欧阳山尊、朱丹、成荫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欧阳山尊

朱 丹 同志：

成 荫⁽¹⁾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²⁾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欧阳山尊（一九一四 —— 二〇〇九），湖南浏阳人。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四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朱丹（一九一三 —— 一九七八），后改名朱丹西，北京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副社长。成荫（一九一七 —— 一九八四），上海松江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政治指导员。

[2] 指成荫等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一九四二年冬，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过这些剧。

致 郭 沫 若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郭沫若^{〔1〕}兄：

收到《虎符》^{〔2〕}，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 泽 东

一月九日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2〕 《虎符》，是郭沫若一九四二年二月写的一部历史话剧。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厘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

致杨绍萱、齐燕铭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绍萱、燕铭⁽¹⁾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²⁾，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³⁾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³⁾，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www.mzdbl.cn

注 释

[1] 杨绍萱(一八九三 —— 一九七一)，河北滦县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一九〇七 —— 一九七八)，北京市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任科长。

[2] 指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导，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京剧（当时称为平剧）《逼上梁山》。

[3] 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见本书 321 页注释[1][2]。

致 周 扬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周扬⁽¹⁾同志

此篇⁽²⁾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³⁾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⁴⁾，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

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 泽 东

四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延安大学校长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2] 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后来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

[3] 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本书第88——123页。

[4] 这是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致 李 鼎 铭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鼎铭⁽¹⁾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²⁾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³⁾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民主人士。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 《永昌演义》，是李健侯根据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事迹撰写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后建立大顺政权的年号。这部小说于一九三二年冬完稿，一九八四年五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3] 李健侯(一八九四——一九五四)，原名宝忠，字健侯。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致 胡 乔 木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乔木⁽¹⁾：

此文⁽²⁾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后来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

致丁玲、欧阳山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丁 玲
欧阳山⁽¹⁾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²⁾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³⁾，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 泽 东

七月一日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丁玲（一九〇四——一九九二），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作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欧阳山，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主任。见本书第315页注释[1]。

[2] 指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3]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出席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

致 郭 沫 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沫若⁽¹⁾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²⁾，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³⁾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⁴⁾，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⁵⁾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

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郭沫若，见本书第321页注释[1]。

[2]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4] 太平军，是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桂、湘、鄂、赣、皖、苏、浙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太平军在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它不能抵抗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于一八六四年遭到失败。此后它的余部又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4]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一九二九年写的反映自己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生活经历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五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六卷。

[5] 恩来，即周恩来。

致 柳 亚 子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亚子⁽¹⁾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 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²⁾，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吧，没有病吧？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健康！

毛 泽 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亚子，即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2〕 指柳亚子一九四一年作的诗《寄毛主席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署时诸公》。全诗为：《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豪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莫华夏。”

致 沈 雁 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雁冰^{〔1〕}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毛 泽 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雁冰，即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又名茅盾，浙江桐乡人，文学家。一九四〇年五月曾到延安，并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

www.mzdbl.cn

致 萧 三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萧三⁽¹⁾同志：

你的《第一步》⁽²⁾，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³⁾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www.mzdbl.cn

注 释

[1] 萧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

[2] 即萧三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

[3] 高岗（一九〇五——一九五四），陕西衡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贾拓夫（一九一二——一九六七），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谭政（一九〇七——一九八八），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彭真（一九〇二——一九九七），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致 柳 亚 子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亚子⁽¹⁾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²⁾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的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鄙视陆游陈亮⁽³⁾，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 泽 东

十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www.mzdbl.cn

注 释

[1] 柳亚子，见本书第 335 页注〔1〕。

[2] 柳夫人，即郑佩宜（一八八八 —— 一九六二），名瑛，字佩宜，江苏吴江人。当时正患阑尾炎，在重庆市立医院做手术治疗。

[3] 陆游，见本书第 243 页注释〔3〕。陈亮（一一四三 —— 一一九四），原名陈汝能，字同甫，号龙川，学者称为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致 柳 亚 子

(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

亚子(1)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2)，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敬颂道安！

毛 泽 东

十月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柳亚子，见本书第335页注〔1〕。

[2] 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沁园春·雪》。见《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页。

致 柳 亚 子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亚子⁽¹⁾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²⁾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³⁾及孙女士⁽⁴⁾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⁵⁾，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敬颂
道安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柳亚子，当时任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参见本书第 335 页注〔1〕。

[2] 于再，昆明南菁中学教员，一九四五年在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一二·一运动中牺牲。

[3] 指柳亚子和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沁园春》。全词为：“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土，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秣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4] 孙女士，即孙荪荃（一九〇三——一九六五），原名孙祥偈，安徽桐城人，谭平山夫人。曾任北平（今北京）《朝报》、《新晨报》副刊主编，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校长，河北大学、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授。一九四三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任常务理事兼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五年参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发起人之一。

[5] 这是柳亚子一九四五年秋写的《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一诗中的两句。

致毛岸英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岸英⁽¹⁾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²⁾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³⁾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www.mzdbl.cn

注 释

[1] 岸英，即毛岸英（一九二二——一九五〇），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是毛泽东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一九四七年四月到晋西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当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一九五〇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和秘书，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在美军空袭中牺牲。

[2] 永寿，即毛岸青（一九二三——二〇〇七），毛泽东的次子。当时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

[3]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

致 周 扬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周扬⁽¹⁾同志

(一) 题字⁽²⁾照办了，但不要印给别处，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二) 在你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目前没有时间。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毛泽东为皖北区滁县专区文工团的题词“面向农村”。

致 齐 白 石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

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白石，即齐白石，见本书第 276 页注释[4]。

致 廖 静 文^{*}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静文⁽¹⁾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²⁾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³⁾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顺致
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这封信是毛泽东派田家英送交的。毛泽东同时还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田家英同志：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注 释

[1] 静文，即廖静文(一九二三 —— 二〇一五)，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

[2] 指徐悲鸿。见本书第 276 页注释[3]。

[2] 田家英(一九二二 —— 一九六六)，四川成都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致李敏、李讷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李敏、李讷⁽¹⁾，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²⁾（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³⁾是有名的，妈妈⁽⁴⁾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 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刊印

注 释

[1] 李敏，一九三六年生，原名毛姣姣，出生于陕西省志丹县，毛泽东与前妻贺子珍的女儿。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一九四〇年出生于延安，是家中唯一在父亲母亲身边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孩子。北大历史系毕业，退休前在北京市委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李敏、李讷当时均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毛泽东写这封信时，她们正在北戴河度假。

[2] 曹孟德，即曹操（一五五——二二〇），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3] 碣石诗，指《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全诗为：“东临碣石，以观苍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4] 指李讷的母亲江青。

致臧克家等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克家^①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www.mzdbl.cn

注 释

[1] 臧克家（一九〇五——二〇〇四），山东诸城人，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致袁水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水拍⁽¹⁾同志：

你的《摇头》⁽²⁾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³⁾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⁴⁾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水拍(一九一六 —— 一九八二)，江苏吴县人，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

[2] 《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载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3] 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载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4] 李希凡(一九二七 —— 二〇一八)，生于北京通州，祖籍浙江绍兴，原名李锡范，字畴九。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一九五五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任编辑。

致 刘 少 奇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少奇⁽¹⁾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²⁾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³⁾，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⁴⁾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⁵⁾，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⁶⁾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⁷⁾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意。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⁸⁾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⁹⁾，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

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着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省宁乡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2] 贺知章（约六五九——约七七四年），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区）人。唐代诗人、书法家。

[3] 《全唐诗话》，编作者不确，有说宋代贾似道作，有说贾似道门客廖莹中作等。世传该书系删节南宋计有功《唐诗记事》而成。

[4] 长安，唐时位置在今西安城南。

[5] 这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一句。原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信中提到的“‘少小离家’一诗”即指这首诗。

[6] 明皇，即唐明皇，见本书第 202 页注释[11]。

[7]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生于碎叶（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8] 齐白石，见本书第 276 页注释[4]。

[9] 《孝经》，儒家经典之一，一说为孔门后学所作。内容为论述封建孝道，宣传宗法思想。这里指贺知章书写的《孝经》。

致 胡 乔 木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乔木⁽¹⁾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²⁾，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 泽 东

七月一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注 释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七律二首·送瘟神》。两首诗为：“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致 周 世 钊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惇元⁽¹⁾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

地日行八万里⁽²⁾，蒋竹如⁽³⁾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⁴⁾，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⁵⁾。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⁶⁾。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周世钊，字惇元。一九五八年七月起任湖南省副省长。参见本书 272 页注释[29]。

[2] 这是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中的一句。

[3] 蒋竹如（一八九八——一九六七），字集虚，别号继碗，湖南湘潭人，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4]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中有“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句。

[5]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中有“牛郎欲问瘟神事”一句。

[6] 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 α 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致 周 恩 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总理^{〔1〕}：

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2〕}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

《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总理，即周恩来。

〔2〕 常香玉（一九二三——二〇〇四），河南巩县人，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河南豫剧院院长。

致 刘 松 林

(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

娃(1):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2)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3)你愁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 爸

八月六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刊印。

注 释

[1] 指刘松林，一九三〇年生，原名刘思齐，山东平度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结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当时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2] 指刘松林的妹妹邵华。

[3] 李白，见本书第 358 页注释[7]。这四句诗出自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

致 胡 乔 木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

乔木⁽¹⁾同志:

诗两首⁽²⁾，请你送给郭沫若⁽³⁾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刊印。

注 释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月一日写的《七律·登庐山》，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 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第 110 页和第 113 页。

[3]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致 胡 乔 木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

乔木⁽¹⁾同志：

沫若⁽²⁾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³⁾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早上

“霸主”⁽⁴⁾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沫若，即郭沫若。

[3] 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写的《七律·到韶山》和同年七月写的《七律·登庐山》。

[4] 见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一诗中的“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句。

致 邵 华^{*}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

你⁽¹⁾好！有信⁽²⁾，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³⁾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 亲

六月三日上午七时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刊印

注 释

[1] 指邵华（一九三八——二〇〇八），原名张少华，湖南常德人。一九六二年初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结婚。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

* 原信没有抬头。

[2] 指毛岸青、邵华各自写给毛泽东的信。

[3] 《上邪》，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一。上，指天：邪，通耶”，语气词。上邪，指天为誓的意思。全曲词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致章士钊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¹⁾先生：

各信及指要⁽²⁾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³⁾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⁴⁾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⁵⁾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www.mzdbl.cn

注 释

[1] 行严，即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人，民主人士。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5] 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毛泽东在另一封给别人的信中也谈到《柳文指要》，说这部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3] 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该文发表前，高二适曾托章士钊转送毛泽东阅看。

[4]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

致 郭 沫 若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郭老⁽¹⁾：

章行严⁽²⁾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³⁾均寄上，
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
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⁴⁾同志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2] 章行严，即章士钊。见本书第 374 页注释[1]。

[3] 见本书第 374 页注释[3]。

[4] 立群，即于立群（一九一六——一九七九），广西贺县人（今广西贺州市）。郭沫若夫人，女书画家。

致 陈 毅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陈毅⁽¹⁾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²⁾善七律，董老⁽³⁾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 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

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⁴⁾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⁵⁾，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⁶⁾，“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⁷⁾。韩愈⁽⁸⁾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段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⁹⁾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¹⁰⁾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陈毅（一九〇一 —— 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写了很多诗词。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

[2] 剑英，即叶剑英（一八九六 —— 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写的诗词很多，现在已经出版的有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远望集》和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诗词选集》。

[3] 董老，指董必武（一八八六 —— 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写了很多诗。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必武诗选》。

[4] 杜甫，见本书第 288 页注释[15]。

[5] 见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6] 见朱熹《诗集传·周南·螽斯》。

[7] 见朱熹《诗集传·周南·关雎》。

[8] 韩愈，见本书第 87 页注释[9]。

[9] 李白，见本书第 358 页注释[7]。

[10] 李贺，见本书第 271 页注释[14]。

致 康 生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¹⁾同志

章士钊⁽²⁾先生所著《柳文指要》⁽³⁾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⁴⁾抑韩⁽⁵⁾，翻二王、八司马⁽⁶⁾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⁷⁾而颂阳湖⁽⁸⁾，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 《柳文指要》，见本书第 374 页注(2)。

[4] 柳，指柳宗元，见本书第 238 页注[6]。

[5] 韩，指韩愈，见本书第 87 页注释[9]。

[6] 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7] 桐城，指桐城派，见本书第 201 页注释(6)。

[8] 阳湖，指阳湖派，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其主张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也多同县人，所以人们把他们这一派称为阳湖派。

致 刘 大 杰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

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¹⁾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愈⁽²⁾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³⁾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与论，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 泽 东

二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 一九七五年八月，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就如何评价韩愈和如何解释李商隐的“无题”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韩愈虽非法家，但也不是醇儒，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复了这封信。

注 释

[1] 刘大杰(一九〇四 —— 一九七七)，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2] 韩愈，见本书第 87 页注释[9]。

[3] 李义山，即李商隐(约八一三 —— 约八五八)，字玉山，号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代诗人。他的爱情诗多以“无题”为题目，后世对其含义解释不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文艺论集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4

ISBN 7-5073. 1156-2

I. 毛…

II. 中…

III. 毛泽东文艺思想.

IV. A841. 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432 号

毛泽东文艺论集

MAOZEDONG WENYI LUNJI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17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90x 1240mm 1 / 32 印张: 11 字数: 195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73-1156-2/A • 87 定价: 20.00 元



网站编辑制作

ISBN 7-5073-1156-2



9 787507 311563 >

定价：20.00元